

「在地」，與及這根煙抽還是不抽 澳門石頭公社與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的合作

“Local,” and We Still Are Not Going to Smoke this Cigarette
Comuna de Pedra of Macau 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Promotion Center of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n Taiwan

張健嫻 | Kin-Han CHEONG
澳門石頭公社主席

我們與被壓迫者劇場最早的接觸，其實是社內成員跟隨另一個本地戲劇團體參與 IDEA 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盟（International Drama / theatre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2010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第七屆世界大會 Young IDEA，因緣際會認識了來自台灣的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T.O. 中心）負責人萬佩萱、曾靖雯等朋友，那年他們帶去巴西的是「希望的豐收」計畫。後來從他們的部落格追看，曾靖雯詳細地記錄了該項計畫移師到巴西在實踐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與這類社區性項目要在短時間內在陌生的異地時，各方所抱持的態度等等，在此先不談，但這篇文章是我未與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的負責人見面前，首先得到的第一印象。

澳門石頭公社與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的首度合作，是從 2010 年底籌備 2011 年年度計劃時生起念頭。石頭公社在本地的兒童藝術教育發展已有多年的經驗，每年暑期皆有固定的兒童身體和心靈的開發課，大約八至九年前也曾有過針對青少年的藝術課程，可是後來因為各種限制而終止。因此對於年輕一輩的社員來說，不管是面對青少年還是要踏入社區，這第一步都好像無從展開，更重要的是，擔心獨自完成後無法自我評估。因此就想到了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的朋友，開啟了真正的溝通。

1 後來才發現，工作坊的這幾天我們玩得很瘋很開心。

前期溝通

我們與 T.O. 中心約定的課程分為上、下兩部分的工作坊，首部分是以介紹被壓迫者劇場為主要內容，面向的首先是本社成員，其次是本地戲劇人士及教師、社工，甚或任何感興趣的人士。次部分是有關 T.O. 在社區中的實踐，經過本社的網絡最後邀得澳門某社會工作的青年服務隊參與，該支服務隊係主力針對北區的「邊緣青少年」，幫助本地社會和報章中「大名鼎鼎」的「邊青」「回到正常軌道」的社工支援，該下半部分的工作坊由台灣 T.O. 中心的導師作為主導帶領，由石頭公社的成員做籌備、聯絡、支援與從旁助理，並在當中觀察與學習。

我們的背景完全不一樣。

與佩萱的溝通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好像佩萱會在彼方拿著木尺子逐行逐段就著我們的電郵來劃線一樣。由於我們的社員大多本身都有正職在身，甚至還要一邊應付大學學業，無法全職在處理會務上，幾個月下來佩萱的電郵就讓我們覺得，哎，這台灣人怎麼仔細到這種程度？相較之下，我們則比較怕麻煩，而且對我們來說已經相當明確的資訊，對佩萱來說還是需要再確認。（看下去你會知道這想法後來有甚麼改變。）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的枝節，與佩萱的溝通倒好，但與北區青年服務隊的社工溝通往來卻比我們想像中反覆，對方的態度良好，只是與青少年進行工作坊的時間遲遲沒有定下來，讓三方的進展都停滯不前。這主要是考慮到青少年本身的上課時間，而社工們則就青少年是否能對超過一小時的工作坊全程保持興趣感到懷疑，社工強調課時一長，「邊青」就很難會「給面子」來上課，就因這點而三番四次更動，而「傳說中的邊青」當然還是素未謀面，對課時和形式的安排只能從我們三方來猜測，到甚麼程度「邊青」就會「不給面子」。

課時從我們預期的三至四天密集工作坊，在社工的意見下嘗試提出持續兩個周末，也就是總期四個整天的工作坊，社工大驚，且原本對於成年來說可以清楚傳遞訊息的文案，似乎對「邊青」來說半點行不通，社工對被壓迫者劇場本來並不認識，對於青少年來說可說是無效的，以社工的看法是，



2 其中一組在模擬澳門社會一則有關「小潭山與大潭山」因地產項目而掘山體的事件中，作為市民、青年實際抱持的心態。

必須讓活動「聽起來很好玩」。結果在三方協商後，密集工作坊演變成為期兩天一夜，而且為增加對「邊青」的吸引力，還必須改以宿營的方式進行。最後宿營的日子總算定下來時，參與的青少年都是以社工帶領為主，由一名社工攜同他／她的「仔」或「女」一起參與，而三名參與的社工亦要求他們必須一同參與，否則「仔女」肯定會「不給面子」……

在在這些，對於石頭公社和台灣 T.O. 中心來說，都是意料之外的，問題來自於我們對這群青少年本身並不認識，社內甚至有其他並沒有參與的社員認為一味遷就「邊青」是不對的，可是 T.O. 的佩萱卻對社工的意見絕對地尊重，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悅，並主動配合更動課程內容。無論如何，也正開啟了這次學習的提醒：一切都是溝通和互相了解、摸索的問題，更何況大家都尚且維持在網上對話的階段。

藝術工作者及導師培訓工作坊

我們的真正合作開始了，首部分的藝術工作者及導師培訓工作坊共七節，從 6 月 11、12 日下午及晚上各兩節（合共四節），及 13 至 15 日晚

上共三節。宣傳單靠本社的網絡邀請，最後報名參加的人數共十人，包括社內成員五人及教師、劇場工作者共五人，選址於石頭公社會址內進行。十人相互之間都是認識的，只是認識的程度不一，有些是中學時的同學，有些是幾年前打過照面，經常遇見但沒能談得上話的人，筆者認為這也是澳門社交網絡本身存有的特點之一，就是大家都彷彿是認識的，但說是了解也談不上。

第一節在互相介紹以後，接下來隨即展開一些劇場遊戲，例如走的練習、傳球等，也有用以開始互相認識的「社會計量」，大多是以暖身和介紹為目的的遊戲，還有將一組人分為一個導演，其餘為演員需要跟隨導演的動作，直至下一年要當導演為止的「導演與演員」遊戲等等。每一個遊戲結束都圍坐下來進行討論，在這些遊戲當中，參加者分享他們意識自己作為個體的感受，同時也意識到環境中的其他人，還有體會到自己比較習慣於當帶領者還是比較習慣於當跟隨者，並從而延伸到合作（傳球）。

在第二節中，「手」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玩了幾個遊戲，當中包括「follow the hand」、「follow the leader」、「手舞」等，以手作牽引，我們體驗的是帶領、被帶領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不安與壓力，以及二人互相帶動的合作等。

每天晚上工作坊完結前，佩萱都請我們各自寫下當天的感想，並收集起來。這次工作坊完全是考慮到我們提供的時間和參與者的接受程度而調整的，第三節（第二天）我們迅速進入肢體的

對話、雕像練習，並開始進入壓迫與被迫的議題。議題是從一個遊戲開始的，兩人為一組，模擬其中一人的手中執有繩子，繩子繫在另一人身上某個身體部位，兩人合作模擬一人被另一人牽著走。其中一組很有趣，JoJo先當被牽扯的一方，對著Jose馬上就露出「這次慘了」的樣子，後來當然是真的被整得有些慘，結果到交換過來，以為可以「報復」的時候，結果卻也不是一如意料地控制對方。壓迫與被壓迫的討論正好從這兒正式切入，壓迫與被壓迫的強弱關係並不如表面，而是當一方認為自己應該會被壓迫，壓迫才得以成立。接下來開始迅速接到從雕像練習模擬社會中的壓迫與被壓迫場景，為了抽取在澳門最直接的議題，導師挑選了一些特定的場景如「警察」、「賭」，以及讓參與者自由發揮設計一個關於「壓迫」的場景，然後由大家一起討論，哪一方（或多方）是受壓迫者，又有哪一方（或多方）是壓迫者。

第五和第六節則從雕像練習開始，進入論壇劇場的部分，佩萱帶來了她們在中國內地山區小學做的論壇劇場紀錄，強調論壇劇場最重要的部分是討論。或許重要的並不是結果，而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而使每一個聲音都被聽見。依照佩萱的分享，論壇劇場並不是為了使問題得到解決，也就那麼順理成章地能把衝突解決，在某些角色中，在外討論的人原以為自己可以處理得更好，當他取代原來的演員把故事繼續的時候，才發現當下那個位置上的無力到底是甚麼。因此，我自己的理解是它的重心並不是很有功效性地馬上改變



3 也是後來才發現，一個簡單的劇場遊戲，當中包含了信任。



4 每一夜，我們寫下自己的感受。



5 有時候我們同時在壓迫與被壓迫。

事件的結果，而是必須先從明白分擔不同角色、不同個性的每一個人的感受開始。

最後兩節，我們被分成兩個小組，就兩個澳門的社會議題嘗試演變成即興劇場。而後再回顧幾天以來工作坊的內容，佩萱才真正向我們解釋，被壓迫者劇場究竟是甚麼。結束的總結討論上，本身在學校中兼任生命教育課導師的嘉嘉提出了合理的疑問，被壓迫者劇場如何可以真正在社區中實踐呢？

佩萱分享她們在台灣的经验，就是必須有落地生根長期深耕的根據點，因此才有台灣 T.O. 中心的存在，另一位導師曾靖雯所做的，更不是單純地辦辦工作坊而已，而是必須真正深入特定的社區當中，住在那兒、生活在那兒，甚至要成為「社區媽媽」。

至此，首部分的工作坊還只是暫時停留在入門介紹的程度，當我們都以為，好吧，讓我們看看當 T.O. 要面向澳門北區青少年時實際要怎樣做的時候，沒想到接下來兩天一夜的宿營，讓我們看到的比想像中還要多……

這煙該抽不該抽之邊青宿營記

因為其他工作纏身的關係，我到達第一場工作坊選址：黑沙青年旅舍時，已經是下午。眼前只見熟悉的石頭公社社友、導師靖雯以及十多個分不清誰是誰的青少年（青年）在海灘上玩在一起。

這班分不清誰是誰的青少年，幾個幾個堆在一起，無論如何玩著，如何打散，最後還是會回到相同的小圈之中。大約就是男生都圍成一圈，女生又分散圍成兩圈。

到後來我才被告知，這是因為這三個圓圈都是依三位社工（兩女一男）為核心自動形成的。而令我最訝異的是，除了當中一位社工外，其餘兩人我從一開始就沒有能力把他們從青少年中區分出來，大概是氣場與青少年太接近的緣故。這天的工作坊主要由台灣 T.O. 中心的曾靖雯導師帶領，石頭公社負責的工作則是只要一起玩，在分組時嘗試將這三個小圈拆解開來。這天晚上的工作坊玩一些如照鏡子、雕像練習等的劇場遊戲，大多數青少年都帶著「玩來究竟要幹嘛」的心情，「給社工面子」才「勉強待著」的態度參與，幾個遊戲下來，總算看清他們各自之間的分別，有某幾個男生因為好強，玩著玩著就認真地跟著我們做起有一定難度的動作，而且滿能接受挑戰，另外也有幾個女生自然而然就發揮著帶領其他朋友、給意見的本能，其他也有幾位是看著覺得別人的樣子好笑，就比較能玩起來了，最後還有兩個女生無論如何都無法放開。

其實三位社工本來性格不同，對這個工作坊的投入程度也很不一樣，這點在過程中表露無遺，而且其中有社工還很喜歡代青少年發言。後來我們發現，這十來個青少年可以保持開放和享受遊戲的程度，與主要負責的直繫社工的接受程度非常接近。





6 受澳門社會事件的啟發，這場模擬的是網絡青年激情但遊行的時候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過程中發生過一些小插曲，事前在電郵討論以及事前與社工進行的一次準備會議中，社工一再強調要大家有「心理準備」，提及了很多這些青少年的「前科」（就是可能會犯的事，例如逃學、服用軟性毒品等）。以致於我們的社員和 T.O. 中心的導師都不約而同把他們想像成染金頭髮、紋身那種很典型的「邊青」形象，於是為了企圖以最短時間破冰，佩萱和靖雯兩位導師明明是從不抽煙的，還是設計了一場要在青少年面對抽煙的「戲」，準備在遊戲與遊戲之間有意無意地讓青少年看得見。這場戲實在很有趣，而且確實有一定作用。因為石頭公社的成員當中本來就有吸煙者（笑），在晚上遊戲之間的小憩中，有幾位男生發現我們當中也有吸煙者，自然而然地打開了話題，白天的那道牆隱隱消褪了一點。這夜讓我們看到靖雯因應情況調節遊戲的速度非常快，跟她的經驗很有關係。

在當晚最後，大家圍成一圈說出感受的時候，其中一個較投入的女生忽然說：「你們無非是想聽我們說很開心、很好玩吧？」導師指出只要講真正的感受就行。但這個問題顯示出這些青少年其實是很敏感的，也似乎暗示了他們有更多近似活動的經驗，甚至有過一套不斷要求他們合作的模式存在。最後在社工的陪同下讓青少年回房間休息。我們當然希望知道青少年的感受，於是三位社工主動提出可以馬上讓他們的青少年在房間寫感想。我自己個人的感覺是，這天已經很累，如果青少年不願意，



其實沒有強迫他們去寫的必要，但社工強調沒問題，青少年會願意寫的。他們如此肯定其實使我甚為疑惑。

當我們回房間準備休息的時候，忽然接到社工的電話，說有要點得跟我們詳談。原來是關於我們的社員在青少年面前抽煙的問題。他們的要點是當然尊重抽煙人士的自由，但我們社員在青少年面前抽煙，會帶來不好的影響，讓他們以為抽煙是對的，（這點現在寫出來還是覺得很奇怪。）而且對家長他們也不好交待，要是讓家長知道由社工主辦的活動，導師竟然會抽煙，家長會對他們失去信心。當我們一再解釋當中有破冰的考量之後，當然社工們又一再重申。到這兒，社會關於「乖／不乖」、「正確／不正確」倒模式定義如此鮮明，其中一位本來就比較不能投入的社工還強調她所帶的兩個女孩子「好乖」，因此不應該給她們「不好的壞影響」。社工離開後我們當然再展開內部討論，交流這天的觀察，正是被形容為「好乖」的兩個女生幾乎完全無法破冰。

嗯，收來的感想中，意見一面倒，大概都在「還好」至「開心」之間。（難道不是很奇怪嗎？）

翌日的工作坊在佩萱和靖雯的要求下，社工和石頭公社的成員都不參與，這主要是想看看青少年是否能離開自己所依靠的社工參與遊戲。這天工作坊讓三位社工很擔憂，基本上他們認為青少年不太能脫離他們進行工作坊。又因為宿營的關係，



7 在辦公室之內，誰是真正的壓迫者呢？



8 多謝地板，多謝台灣 T.O. 中心，也多謝每一位。

青少年們接近凌晨才睡，早上的工作坊必然提不起精神，導師原定在這天進行「希望的豐收」內「市民筆記本」部分的活動，結果卻要從頭開始，透過大量的遊戲花一整個早上的時間來暖身，花了好大氣力才稍稍把三個小圈子的界線抹掉。但到了下午，基本上又恢復原狀，而且部分男生開始抗拒，刻意講髒話，有一個刻意在雕像練習中提及許多「妓院、妓女」等的意象，另外兩個則睡在地上不願意起來。只有其中一位社工負責的幾個女生越來越投入，但難免受到其他人的影響。至於被形容為「好乖」的兩位女生則坐在遠處，不願意歸隊。下午社工們被邀請旁觀雕像練習的小展示，女生組模擬了一場在食店打工被其他同事欺壓的情景，在導師的指導下，由其他在場參與的朋友重演，使被壓迫者的衝突解決了。作為這兩天的總結，導師請青少年把自己的手畫在紙上，然後隨直覺在手的圖案中寫下一個字作為對這兩天的感想。在我們回收紙當中，有兩張寫的是髒話，而這兩張紙剛巧就是由「好乖」的女生寫的。

這兩部分的工作坊結束了，我們三方作最後的檢討，大家均認為時間太短，需要有更長期工作坊的計畫。

但這次工作坊讓我們看得更多的，其實是社工與「邊青」之間的依存關係。「邊青」其實沒有那麼恐怖，起碼就我們接觸的這十個青少年來說其實並不是壞，只是無聊，對很多事提不起興趣。其

次就是比較缺乏自信，無法獨立，需要群體行動，很依賴社工。而社工對待青少年的方式，也有間接使他們更加依賴的情況，近乎模仿社工本人的行為和價值觀。就我們所見的，似乎最直接的影響還是社工本身，因為該種關係的建立，社工本人的性格是比較積極樂觀和抱持開放的態度，才能確實發揮正向的作用，而當社工傾向於不開放，也完全影響到青少年。這種「人影響人」的方法無疑是有效的，但同時也是盲點，而社工也是人，他們甚至我們，都不一定與「邊青」相差很遠。導致「偏差行為」的，也未必是甚麼嚴重邪惡的心性所致，甚至有可能只是青少年們出於對於社會某些特定的「模式」（例如必須講很開心）所作的反抗。

需要聽見對方的感受的並不一定是青少年們，反而是社工的和我們的課題。這是我們這次工作坊感受最深的學習。

所有工作都結束後，台灣 T.O. 中心朋友們在澳門的最後一夜，正要好好吃晚飯後帶大家到處看看，這時，原本無比開朗的靖雯完全進入「鎖機狀態」，結果她整夜都默不作聲，嗯，原來她，進入自動倒帶檢討的狀態中去了。

或許，也可以請靖雯將她的評估寫出來，很可能是另一個故事。

（本文圖片攝影：廖家瑩〔台灣被壓迫者劇場推展中心〕、小嫻）

